

第二十九章 加长的沙发

中日之间的军事冲突没有像上次那样被英国公使成功地调停,尽管现任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爵士(Sir Hughe Montgomery Knatchbull Hugessen)尽了更大努力,甚至在赴前线调停的途中遭到日本军机误炸受伤。

冲突恶化成全面战争,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战线从上海向扬子江中游转移,上海地区的战火渐渐平息下来。上海租界因其特殊地位,形成了自中国长毛内乱后第二次“孤岛”式的太平世界,给扬子江下游的大量战争难民提供了慷慨的避难所。跟1860年代相仿,战争难民给租界带来了空前的拥挤、不安和繁荣。193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租收到达折合1000万两银子的货币,是1864年租收的一百倍!

工部局竭尽全力维持民生常态,使租界沿着九十多年来在黄浦江畔这块土地上形成的规迹,原样过下去。如果为了适应周边的巨大变化不得不作出调整,那么执行调整时务必将扰民程度降到最底点。这一点,从工部局董事会本年度的每两周周会记录上清楚地反映出来。

1938年5月5日的周会上,总董樊克令(Cornell Franklin)通知各位董事,日方上海无线电监督处负责人浅野少佐和日本公使馆一等秘书田嶋已经同意考虑工部局提出的抗议,采取克制行动,不在公共租界强制执行中国人拥有的电台必须向日本当局登记,以确保中国人的电台不播放反对日本或其他政治性节目。工部局和日方达成谅解,由工部局授权巡捕房监督中国人的电台不播反日节目,而这种监督并不包含日方原先要求的规定各电台的波长和频率。

1938年7月6日的周会上,总董谈及收到一家法国彩票公司的来信。工部局曾经批准

该公司在公共租界销售救济战争难民的彩票。现在该公司在信中同意工部局所提出不允许出售其他彩票的意见。关于工部局提出应将收入移交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分派给得到正式承认的难民机构一事，该公司称其负责规定分派工作由该公司董事会所委托的特别委员会进行，工部局两位董事的名字已经包括在该公司试行的彩票分配委员会中。所以，总董认为委员会的组成情况足以向工部局保证彩票收入能够得到合理安排。

在同一次周会上，总董提及工部局决定在7月10日前暂不允许巡捕房根据地产业主的请求参与协助驱逐无偿佔据业主房产的战争难民。工部局已收到各难民救济机构的一份联合申请，要求再次推迟巡捕房的此类行动，因为他们尚未找到另外的收容所房屋。总董向华人董事奚玉书先生保证，除非找到另外的难民收容处，否则工部局将不会准许巡捕房采取驱逐行动。

1938年7月20日的周会上，为方便和加速难民自房产主希望收回的房屋中搬出，董事们批准了根据致国际红十字会草稿所写的信。该信提及由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创始机构、难民问题顾问委员会以及工部局各处组成难民收容所迁移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能就是起草一份计划，说明难民从这些房屋迁至新收容所去所持的态度和次序。

1938年8月5日的周会上，工务处代理处长说，最近他查看了几处可能作为难民收容所的地皮。他预期在租界内可以有11块空地，再加上在边界线上的第12块土地足够为30000难民提供住所。这12块土地将会提供所需的90亩地皮，这样就能按他与卫生处长同意的设想建一每亩平均人口密度为360人的难民收容所。对比之下，救世军办的难民收容所的人口密度过高，每亩地达750人。关于每亩地的租金问题，工务处长估计为每月总额约一万元。

上述工部局董事会反复讨论的难民和难民收容所问题甚至超出了中日军事冲突的范围。1938年开始，从德国、奥地利、波兰有2万犹太人逃避纳粹迫害，来到上海租界定居。多年後，人们把这份功德归因于中国人的好客。其实，吸引犹太难民最主要的原因是上海

公共租界不受任何外国政府管辖，是当地华洋居民自治的地方实体，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护照或签证就可进入、生活水准却跟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可以匹配的地方。

历经颠簸的犹太难民来到上海，迎来一波波救济热潮。第一波救济来自上海最资深的犹太社团：伊拉克犹太佬。以沙逊家族、嘉道理家族、哈通家族等超级富豪牵头的上海当地犹太社团慷慨解囊，向每位难民每天提供5美分生活费，保障难民的基本生活。第二波救济来自美国的犹太社团和国际红十字会，在公共租界向犹太难民提供医疗教育福利。第三波救济来自一个最不可想像的地方：日本当局。

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日本当局认为犹太人都是有钱人，讨好犹太人可以使有钱的犹太财团投资开发“满洲国”，并且通过犹太财团影响英美政府接受日本在远东扩张的既成事实。因此，日本当局在为犹太难民寻找住所这件事上同公共租界工部局和各难民救济机构十分合作，几番协调後，各方同意虹口“日租界”提篮桥一带为最适合犹太难民居住的地方。因为英国业广地产公司（Shanghai Land Investment Company）在那个地区开发许多房地产，战争爆发後，中国居民大批逃离那个地区，造成大批房屋空置，刚好让犹太难民入住，业广公司可以继续收租。

定居在提篮桥一带的犹太难民开始摆起地摊，出售他们逃难带出的财物。不下雨的日子，华德路（长阳路）犹太摩西教堂附近的街面可以说是一个犹太集市大杂烩：年老的夫妇向过路人讨价还价出售古董级高档家具；中年人向过路人展示皮草、首饰、收音机、钢琴、汽车；少年人高声兜售挂表、皮鞋、玩具；家庭主妇出售刚出炉的自制犹太面包。。。

容定的汽车在9月30日那天途经华德路时，老乐不得不小心翼翼放慢车速，以免撞到路人或无处不在的地摊。

自从去年中日发生军事冲突以後，这是容定第一次来到这个地区。如果不是陈则民要离开上海，松岗少爷邀请容定参加替陈则民送行吃饭，容定是不会到这个地区来的。这里同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相比，当地日本侨民庆祝军事胜利的味道特别浓，令容定很反感。

但是，容定从不拒绝任何吃饭的邀请，尽管他连陈则民离开上海要去什么地方都不清楚。

松岗请客吃饭的餐馆叫“六三花园”。餐馆门前有典型的日本装饰，挂着红黄相间的纸灯笼和五彩缤纷的小旗。松岗订下的包间在二楼，通向包间的楼梯比普通日本餐馆的楼梯要宽，足以容纳两个端着盘子的美女招待同时上下，显出这家餐馆的气派不凡。包间里的矮桌后面摆着有靠背的织锦坐垫，矮桌上放着象牙筷子、精致的瓷器餐具、洒上淡淡香水的手巾。

两位穿深色和服系细腰带的中年女招待端上一盘盘粉红色和乳白色的新鲜生鱼片。跟别处日本餐馆提供的日本抹茶不同，这家餐馆提供的是浓俨茶。两位女招待用象牙筷子夹去浮在茶水表面的茶梗，给主客三位斟上茶。松岗向她们使了个眼色，她们便悄然无声地退出包间。

不等容定开口询问，松岗颇为兴奋地告诉他陈则民前辈要回苏州老家主持一些大事，下次何时回上海，现在说不上，所以特地请容定前辈作陪，替陈则民前辈设席送行，感谢陈前辈多年对自己的关照。

“陈大律师要回苏州开业吗？”容定放下夹起一片鲈鱼的筷子，很惊讶地问。

“不是开业，我这次是要回苏州替乡亲父老卖力。”陈则民得意地回答。“仗打输了，政府跑了，家乡一团混乱，需要有人出来收拾局面，老百姓才能重新安居乐业。所以，我决定回苏州主持家乡的安定大计。这件事，松岗君是很赞成的。可是设席送行，实在受之有愧，受之有愧。”

容定立刻明白陈则民是要回家乡替日本军方做事。七年前，商埠印书馆董事郑孝胥去“满洲国”当总理大臣，曾给容定带来莫大震撼，他听从四子容穗的意见将郑孝胥赠送的题字从书房的墙上撤下。但是人家郑孝胥毕竟是前清逊帝的老师，逊帝当了“满洲国”皇上，老师去帮忙，不脱人情之常。那么，眼前这个陈则民又是为什么要去苏州替日本军方效劳，而一贯反战的松岗居然支持他这么做呢？

“松岗少爷你支持陈前辈这么做？”

“容前辈，我猜想你误会了。我支持陈前辈这么做是因为我痛恨日本军方鬼迷心窍，一味扩大战火，给中国老百姓带来莫大痛苦。要鬼迷心窍的日本军方在节节取胜的现在停止战争是不现实的。既然停止战争暂时做不到，减轻中国百姓的痛苦就是当下务实的课题。我一直在想，如果去年年底日本军队打进南京时，如有一个中国人组成的机构同日本军方打交道，局面就不会那么混乱，那场使日本在国际社会颜面扫地的日军暴行就不会发生，这样对日本，对中国，尤其是中国老百姓，不是都好吗？所以，我听到陈前辈要回苏州主持当地的和平局面，很高兴。至少，我觉得这跟我去年在上海南市协助贾基诺神父开展难民收容所的工作，没有什么两样，对吗？”

松岗指的是去年他根据法国籍贾基诺神父的请求，协调日本领事田中正一跟神父谈判，派遣日本宪兵队塚本大尉率领二十名日本宪兵守在神父在南市办的难民收容所门口，阻止日本军人闯入难民收容所捣乱，从而使神父的难民营工作得以展开。

容定觉得松岗的话不无道理，但是他觉得还是缺乏点什么使自己不能从认可松岗帮助贾基诺神父，进而认可陈则民回苏州之行。那么，到底缺乏什么呢？陈则民接下来的一番话使容定找到了缺乏的那点东西。

陈则民从容定的脸色，看出容定并不认可自己的回乡之行。他刚想张口解释，两位中年女招待回到包间，送上新的一盘盘生鱼片，撤下吃剩的空盘子，并且给主客三人重新斟茶。

女招待们再次悄悄地离开包间後，陈则民对自己的回乡之行作了解释。

“容大律师，我相信你是最合适对我赐教的人，因为你一没有党派，二没有当过官，可以完全用不带偏见的眼光看待我的决定。我是这么想的，今天的苏州是日本人的天下，就像今天的上海租界是英国人的天下，两地都不是中国人的天下。上海租界的华人正在安居乐业，我回苏州就是要让苏州的华人也快些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这同容大律师今天在

租界当律师为租界居民的安居乐业作贡献，请教有什么两样？”

容定想了一想回答：“我觉得上海租界跟今天的苏州，性质不一样。上海租界原先是荒滩，没有人烟。当初主要靠洋人努力，才有上海租界的今天，人口超过百万，成了远东仅次于东京最繁华的城市。执行市政府功能的工部局董事会里有五位英国董事、五位中国董事、两位美国董事、两位日本董事，每位董事具有同等份量的投票权，而这些董事又都是从各国纳税人会议选出来的，所以上海租界实际是一个各国居民组成的自治社会。在租界，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已经缩小到仅适用于条约国（treaty country）的本国公民。即使在领事裁判权没有缩小前，华人要求平等对待的诉求也从来没有受到粗暴打压。比如说，我本人在上海弄清独立後代表华人商会要求驻沪领事团撤销对会审公廨的督导，英国人并没有因此撤销我的律师资格。在法庭上，老百姓可以告工部局，年年有华人打赢洋人的官司。总之，英国人也好，法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在上海租界，法律上华人跟他们是平等的。再看看今天的苏州，不要说享受跟日本人平等的地位，连电台的广播内容都受到监视，不允许有任何同日本军方不同讲法的节目，老百姓看到日本兵都要强迫脱帽鞠躬，这个样子怎么谈得上安居乐业呢？陈大律师，我劝你三思後行。”

听了容定的话，陈则民脸色发红，一时答不上话。松岗觉得容定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能使他改变支持陈则民去苏州。他觉得联合通讯社的一位记者同事发表过的一篇文章足以辩清陈则民的立场。

“容前辈，我的一位同事今年二月在《改造》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进入事变第二阶段》的文章。其中最後一段最能表达我支持陈前辈去苏州的理由。文章里大致是这么说的：‘我们必须全力协助佔领区内的居民，尽快实施仁政。请想象一下手持日本国旗，茫然站立在路边的老人，想象一下那些难民收容处的儿童，唱着不知含意的《君之代》歌曲无聊地戏耍，想象一下年轻母亲抱着饥饿的乳儿在寒冷的天气里乞讨，他们到底有什么罪

呢？’容前辈，为什么难民们还不能离开收容所呢？这是因为难民们的家乡正处于混乱状态，据我所知，现在在占领区为日本军方做事的华人都是一些层次很底的地痞流氓，他们正在趁火打劫他们的华人同胞。所以，占领区里非常需要像陈前辈那样有学问有品德的高层人士去收拾局面。”

松岗的话显然给陈则民很大鼓励，他接过松岗的话题说：“事情确是这样，目前苏州的局面乱透了，城外的大米怕被日军没收，不敢运进城，城里的米价疯涨，流氓地痞趁机敲诈老百姓。我这次回去，第一件事就是要安抚我认识的粮商们，把米运进城，这样米价才会降下来。容大律师你说说看，这样的景况，我能不回苏州去吗？我去苏州后，要是上海律师公会问起我的下落，还希望容大律师替我向公会的同仁解释我的苦衷，不要对我产生误解。”

说到这里，陈则民合拢双拳，向容定作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揖。

对于陈则民的要求，容定觉得很难决定答应与否。一方面，容定心底里仍旧不能认可陈则民的苏州之行，另一方面，容定觉得松岗和陈则民说得都有几分道理，而依照容定的个性，正确的就是正确的，错误的就是错误的，不存在随机应变，用减低真相的代价，来减轻真相的残忍面目。任何是非不清，必须搞得清清楚楚才能作结论，而不是模棱两可的敷衍过门。那么，到底该答应陈则民的要求吗？

女招待托着一个盘子拉开包间的纸门走了进来，打断了容定的思路。

女招待的盘子里不是什么生鱼片，而是一张纸条。松岗唸了一下纸条，马上要女招待递给容定看。纸条上写着：“请高易律师事务所容定律师下楼，有急事。诸启。”

容定认得纸条上的字是律师事务所里的大写（文书）诸先生的笔迹。咦，这位只会抄抄写写的诸先生怎么找自己找到餐馆来了呢？今天中午离开律师事务所时，没有关照什

么重要文件让诸先生抄写呀？

容定跟着女招待下楼，在餐馆门口看到一脸愁容的诸先生正在等候自己。容定跟诸交谈了一句话，脸色大变，立刻转身上楼向松岗和陈则民匆匆告辞。

五分钟後，容定和诸先生坐着老乐开的汽车向诸先生的岳父唐绍仪家驶去。途中，诸先生详细地告诉容定唐府发生的大事。

岳父唐绍仪通常早上八点用早餐。餐桌上摆着三副餐具：英国瓷器杯盘、高脚玻璃杯、以及银器刀叉。他的妻子吴夫人最近去香港小住，所以陪同他用早餐的是第十一女儿宝璐小姐和女婿诸先生。早餐的内容是洋葱土豆作配菜的煎腌肉、鲜果汁、烤得焦黄的面包、和又浓又香的土耳其咖啡。

唐绍仪习惯在早餐後边喝咖啡边阅读当天的报纸。听差老曹递上七八份中英报纸时，女儿女婿便告退离开餐厅。听差老曹个子很高，脸庞瘦削，穿着上等的花呢全套西装，他和宽肩膀、脖子粗壮、终年穿着长衫的门房老焦都是跟随唐绍仪多年的仆人，他们俩负责唐的饮食起居和警卫工作。尤其是门房老焦，像是天生的心理学家，一眼就能看透访客的身份。在他宽大的长衫下，终年佩戴着手枪。

唐绍仪拿起《申报》仔细地阅读起来。

今天的《申报》头版既没有用报导日军在佔领区的狂妄行为，也没有用报导中国军队似是而非的战绩，更没有用报导雷声大雨点小的西方外交干涉来激怒年轻读者，或是使成年读者失望。今天的《申报》头版却出现一些好搬弄是非的记者撰写的关于日本军方正物色中国高层人士去佔领区安抚中国民众的猜测文章。这些文章用藏头去尾的方式，暗示日本军方的物色工作在北方集中在某个下野的军人统帅身上，在南方集中在某个退休的总理级人物身上。通过人物的年龄、籍贯、现在的居住地，暗示那个退休的总理级人物就

是他唐绍仪。

这类报导，唐绍仪以前在报上也见过。但是，今天《申报》上的报导或许为了迎合读者的心理，过分加油添酱，好像他唐绍仪已经跟日本军方达成某种协议，使唐绍仪看了很气愤。他唐绍仪一生关心因满清腐朽而积弱受欺的国家前途，即使在五十四年前，中国处于比今天远远虚弱的年代，他都能在朝鲜国赞助袁世凯三天之内救出被亲日派劫持的朝鲜国王，平定日本人策划的朝鲜宫廷政变。更何况在洋人确保治安的上海租界，已经退休的他怎么可能轻易跟日本军方走到一起去呢？他唐绍仪为了开发中山港，连屈就中山县长那么丢身份的事情都肯自愿去干，还不足够说明他是一个为了社会肯牺牲自己，决不嗜权成瘾的人吗？到目前为止，日本军方透过他大女婿同他的每次接触，内容都暗中告诉那个正在节节撤退的中国政府。说白了，他唐绍仪是在替中国政府打探日本军方是否肯停战的底线。

有时候，唐绍仪真想起诉那些搬弄是非的记者。但是，他顾虑到诉诸法律会造成更大的新闻轰动，反而成就了那些记者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心愿。

“老爷，赵先生来了。”听差老曹前来报告。

“请他在客厅见。”唐绍仪放下报纸和心里的烦恼，站了起来。

赵先生是通过唐绍仪的一位老朋友儿子介绍来的一位古董商人。门房老焦记得这是赵先生第三次来访。第一次是唐绍仪老朋友儿子谢少爷带他来介绍给酷爱收集古董的东家；第二次是赵先生独自上门拜访，跟东家谈了很久，谈得很高兴。尽管已来过两次，赵先生进屋前仍然抬起双臂让老焦仔细地上下检查自己后才跟着听差老曹来到客厅里坐下。

赵先生长得温文儒雅，修长的个子，薄薄的嘴唇，白皙的脸庞上镶着一对流星般灵

活的眼睛，右手中指戴着一枚钻石戒指。唐绍仪走进客厅的时候，赵先生端着女仆送上的茶，正在饶有兴致地欣赏墙上那幅绣着西方古典故事的壁毯。

“赵先生，是不是看中这幅波斯壁毯了？对不起，这幅壁毯世界上只有两块。我是不会用它来跟赵先生交换古董的，请。”唐绍仪请古董商人坐下。

唐绍仪认为世界上有两类古董商人。第一类是唯利是图的黑心商人，一味漫天要价，谁出的价钱最高，就将古董卖给谁。第二类是讲究格调的精明商人，经过考察，觉得买家有格调欣赏一件古董後，才开始讨价还价，以最高的价格售给买家。赵先生属于第二类商人，前两次来访是为了探明唐绍仪到底有没有格调欣赏他手里的一件珍品。经过交谈，赵先生觉得唐绍仪对宋朝官窑瓷器的胎骨、釉色、造形、制作过程有相当深的研究，才告诉唐绍仪他手里有一只北宋官窑的青釉瓷花瓶待售。唐绍仪听了很感兴趣，因为他已经拥有一只南宋官窑的白釉瓷花盆，盼望得到一件北宋官窑瓷器，从此凑齐两宋的官窑。这次来访前跟赵先生预先说好是要看货成交的。

“赵先生，那件东西怎么没有带来？”唐绍仪看到赵先生两手空空，有点不满地问。

“唐大人，东西带来了，在门外我的汽车里，我们先谈拢价钱，然後验货，怎么样？”

“哪有不看货先定价的道理？”

“是这样的，天津的张鸣歧大人愿意出十万元买这件东西，康圣人（康有为）的女公子康同璧愿意用宋代范成大的真帖交换这件东西，这是现在的行情。”

“你这么说，是不是为了抬高这只瓷瓶的身价？”

“他们两家都不是内行，所以，我给唐大人优先权。在商言商，请唐大人不要让我吃亏。”

“好吧，依你。把东西拿进来。中意的话，今天就开支票给你。”

赵先生站起身朝唐绍仪鞠了一躬，退出客厅，走出唐府。

十分钟後，赵先生捧着一只一尺见方的雕花黄杨木箱回到唐府，经过门房时，他打

开木箱让老焦检查箱子和里面的古董。

“跟我到书房来，我要仔细看看这件东西。”唐绍仪对捧着黄杨木箱的古董商说。

跟客厅相联的书房，窗户面向後花园，非常幽静。除了从後花园别处看不到书房内的动静。书房里有一只加长的五人座长沙发，唐绍仪请赵先生跟自己一起在加长的沙发坐下。沙发旁有一只三格抽屉的首饰箱，唐绍仪从口袋掏出一把细巧的钥匙，打开最上层的抽屉，取出一把放大倍数极高的放大镜，然後从古董商手中的木箱里取出那只青灰色的北宋官窑瓷花瓶。

瓷花瓶上有一些不成规则的凹凸纹痕。这些纹痕是在烧制过程中釉胎膨胀造成的，称作冰片。冰片的模样反映出不同年代的工艺，是签定这件瓷花瓶的年份最重要的标记。唐绍仪弯下腰，把脸最大程度凑近放大镜，聚精会神地察看瓶壁上每一道冰片。

古董商人悄悄用右手中指上的戒指按住木箱壁上的一处花纹，像开锁一样拧了一下，木箱箱壁的夹缝里露出一片蓝森森的锋利金属，木箱的那处箱壁同时上下分离，形成一柄袖珍钢斧。

古董商人举斧对准唐绍仪银发复盖的後脑勺砍去。。。血点撒在加长的沙发上像喷水池喷出的红色水花。